

政治 治學 新論

西方學理與中華經驗

鄭宇碩・羅金義 編



政治學新論

西方學理與中華經驗

鄭宇碩、羅金義 編

中大學生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學 1997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201-760-6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New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Science:
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ese Experiences (in Chinese)**

Edited by Joseph Y. S. Cheng and Law Kam-yee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760-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政治研究對本土關懷的回歸 — 代前言

羅金義、鄭宇碩

我想沒有人會願意受到經驗主義的制衡。我們通常都信奉那些超越於經驗研究之上的價值，我們懷抱的希望和觀念也往往無法落實在經驗主義的框架裏。然而，沒有了希望和觀念，人是無法忍受其生命的。所以，很自然地，我們有了希望、信仰與承擔，這並非是錯誤的事。錯誤的是，我們被意識形態的意像所誤導，而信守了那些一廂情願的思想以及替換了那些能夠由經驗途徑所知道的事物。我們不只是應該區分「實然」(what is)與無法以經驗證明的事物，而且在應用它們的時候，不應該放棄理性的論據與經驗的證明。

— 引自〈馬克思學說與極權統治 — 柯拉克夫斯基訪問錄〉¹

九十年代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政治學「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時代告終之時，「後行為主義狀態」卻令人滿腹焦慮：大家對極端的經驗主義的宰制和規限有了覺醒，但面對政治研究的前路，卻彷彿找不着希望與承擔；David Easton驚嘆政治科學失掉了目的，² S. M. Lipset哀鳴學科正在盲目地漂流。³ 這不單止針對方法、理論上的僵化和不思進取，甚至在探索的議題上，政治科學研究與現實政治之間密切聯繫的傳統，⁴ 也彷似後繼乏力。

編者蒙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贊助編務開支，謹此致謝。

我們則可以積極地看待這西方政治學的低迷狀態。大批對現況表達焦慮、對前景流露徬徨的論述，都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共同結論：要了解現況以至開拓未來，就必須認真檢討學科的過去。這不是一種單純、枯燥、機械化的例行公事，而是為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跟現實政治的經驗，以及對政治前景的希冀和理想，重建三者之間恰當的關係和互動，必不可缺的基本事工。

在美國，檢討政治學學科歷史的對象不能不以行為主義為中心。⁵ 在華人政治學界，要關顧的層面就太多了，一切還只是在起步階段。而且，所謂「關顧」也常有各走極端的弊病：一是基於意識形態原因，刻意地把所謂「資產階級政治學」予以罷黜，獨尊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一是「拿來主義」，全盤照搬西方學理，華人學界的所謂著作幾乎與翻譯西方著作無異。相信沒有行家會否定西方政治學之於華人政治學的相對先進水平，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否別無更中庸、動態的可塑性？

二十年多前鄒謙(Tang Tsou)和Richard Wilson等分別呼籲中國政治研究者應該突破知識上的孤立和障礙，多配合和應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新概念和理論。⁶ 早期美國學界的中國政治分析確曾被批評是過分簡化和生硬，結論多是方便作為政治宣傳工具，鼓吹「西化」的決定論，以打擊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⁷ 不過，二十多年來中西學者對華人政治經驗的研究已有長足進步。⁸ 到了近年，甚至已有學者提出：現在是不是到了中國研究「反饋」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的時候？⁹

這兩種進路，其實正是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理論更生循環的兩個步驟，理應並行不悖相輔相成；而這本論文集的理想正是為了推動這循環機制作出嘗試。大部分篇章的寫作綱要，是把行家對華人社會的政治研究經驗，與西方主流學理相結合以夾敍夾議。文集首三個部分共十五章和第十七章，涵蓋了政治研究的主要面向和分析進路，在論述時都盡量以華人社會的經驗作例證。文集最後一部分闡析了大陸、台、港三地的政治研究新發展，論證本土研究與西方主流學理的關係。在這套兩步循環的背後，希望讀者能發現我們不是在匯報一堆抽象的概念及其定義，又或在介紹一堆實驗科學的工具，而是着意地回應一連串變動中的規範性問題和挑戰(特別針對華人社會)。這是政治研究向本土現實關懷

的一種回歸，是所謂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種努力。Robert Dahl對政治研究的深切體會，加上Leszek Kolakowski就經驗、理性研究與希望、信仰和承擔之間關係的反思，實在值得政治學行家們仔細玩味：

我認為政治學研究的功用，不單是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政治世界。它應當還能幫助我們在達成我們的目標、結果、希望和意欲時，表現得更睿智。政治活動無可避免地也是一種道德行動。

—— 引自〈半世紀以來政治學的反思〉¹⁰

香港實在是一處十分有趣的地方 —— 過去數十年，它可能是華人社會之中，在政治學研究上被受最少政治勢力牽制的地方（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但時至今日，我們反而還未看到這裏有一本用母語寫作的政治學導論書籍。未來，沒有人知道在政治範疇內仍能暢所欲言/研的日子還有多少，上述饒有意義的理論化、本土化更生循環工作又遲遲未見有蓬勃發展，於是我們不揣淺陋當了隊開路工兵，尤其希望裨益於政治學的新一代入門者。文集的水平是明顯的尙待改進，但願大家不吝指正和支持，相信這理想定能發揚光大。文集的主編工作是在廖劍雲先生的引發下開展的；過程中得到曹口新、唐文方、華世平三位教授提供協助；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尤其是匿名審稿人，對文集的內容改善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支援；編輯和製作上亦多得黃彩屏和徐振邦同學的努力；當然，居功至偉的是各位作者的耐心和貢獻，謹此致以深切謝意。最後，特別感謝陳淑媛。

一九九七年二月於香港

註 釋

1. 轉引自陳榮灼等編譯：《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對話錄》（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年），p. 137。
2. David Easto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and Present," in *Divided Knowledge*, edited by David Easton and Corinne Schelling (CA: Sage, 1990), p. 143.
3. 轉引自 James Farr et al.,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esearch Programme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4. 舉例說，David Ricci對行為主義試圖將政治學「自然科學化」甚不以為然，認為是對學科的嚴重誤導；回顧學科的歷史，政治學最意義深長的議程是對美國民主和進步的現實評定和實質鼓勵；見其名著*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尚佳之檢討成果不少，綜合性強的可參考註3一書，以及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eds.), *Discipline and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6. Tang Tsou, "Western Concepts and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World Politics*, No. 21 (1969), p. 664; Richard Wilson, "Chinese Studies in Crisis," *World Politics*, No. 23 (1971), p. 297.
7. 何漢理(Harry Harding)，〈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發展〉，《知識分子》(紐約)，1990年冬季號，頁29–36。
8. Yung Wei, "Social Scienc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 Critical Evolution," in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Yu-ming Shaw (Westview Press, 1985), pp. 321–39.
9. Lucian Pye,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1992), p. 1162;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No. 36 (1984), p. 297.
10. 達爾，〈半世紀以來政治學的反思〉，《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年6月號，頁156。

目 錄

政治研究對本土關懷的回歸 —— 代前言 vii
羅金義、鄭宇碩

甲部：總論

第一章	政治學範疇之探索	3
	曹日新	
第二章	政治科學方法論：精神、語言、途徑與研究方法	29
	孫同文	
第三章	政治現象與政治學研究：一個 <u>理性選擇論</u> 的看法	53
	何高潮	
第四章	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新論：論公正、自由、 民主三大價值的演化	89
	陳祖爲	
第五章	比較政治學：方法論分析	107
	王紹光	
第六章	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	129
	陳智宏	

乙部：政制

第七章	憲法與政制：世界性考察	145
	彭懷恩	
第八章	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	171
	蔡子強	
第九章	公務員制度：不斷演變中的典範	197
	張炳良	
第十章	公共行政：人類文明的基石抑或絆腳石	227
	余偉職	

丙部：政治與社會

第十一章	政治民主化：西方理論回顧	263
	成 名	
第十二章	政黨與政黨體系	293
	周陽山	
第十三章	利益團體：在西方的運作、在東方的前景	315
	藍志勇	
第十四章	政治文化的結構系統	345
	陳綺文	
第十五章	民意調查：發展歷史與政治功能	369
	鍾庭耀	

丁部：中華經驗

第十六章	美國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模式、動向與典範轉移 ..	401
	趙穗生、崔之元、羅金義	
第十七章	公民社會與中國政治	435
	童燕齊	

第十八章 研究台灣政治的新發展	459
王家英	
第十九章 研究香港政治的新發展和問題	487
盧兆興	

甲 部

總 論



第一章

政治學範疇之探索

曹日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凡隔離而自外於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仙。」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253a26)

1.1 導論：一門斬新的大學學系

在世界各國，政治學都是一門既古老而又新穎的學科。¹ 說它古老，因為從有史以來文獻上便記載着人們對政治現象的思考；說它新穎，因為它是列入大學學系裏最新的一門社會科學。它不但最新的，還可能也是最後的一門人文社會科學(Andrew et al., 1982, p. 2)。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主要大學才逐漸設立政治系。迄今，二十一世紀行將來臨的時候，歐洲許多大學仍然沒有政治系，即使在政治科學發源地的美國，一些規模較小的大學也沒有獨立的政治學系，政治學分科課程不是設在歷史系就是設在其他的社會科學專業裏。² 至於社會主義國家，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蘇聯解體的前夕，東歐脫離馬列主義之時，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開放後，政治學不但沒有地盤而且遭到嚴峻的批判，其途徑之曲折可從已故政治學家錢端昇口中略窺一二，他說：

¹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Oneonta校區政治科學系榮休講座教授

在建國之初，我們曾經希望有新的政治學……而且那時也一度出現過以「新政治學會」命名的組織。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在學術方面由於種種原故，沒有足夠的勇氣堅持向新的方向前進，那時我們片面強調向蘇聯學習……但是蘇聯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六十年來幾乎沒有甚麼好的進展，對政治學的研究尤其缺乏（錢端昇，1981, p. 23）。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來，政治學在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都有長足的發展。中國大陸到美國考察及留學的青年學者自發地成立了「中國留美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會」；其第十一次年會，意義深長地於1995年在香港舉行。

1.2 難以達成共識的定義

政治學的範疇，簡扼地講包含對政治現象的認定(to identify)、分析、解釋與解答，及尋求對研究這些現象的有效的研究方法。範疇在此只指出政治學所探索的綱領，詳解需見諸本書其餘各章。雖然提到政治或政治科學，人們都有個籠統的概念，但是其明確的科學定義卻是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雖然如此，就像史密斯(Edward Munroe Smith)所說的，人們仍然感到「『政治學』這個名詞確實需要一個〔共識的〕定義。」這句話是在一百一十年前，即一八八六年，載於美國的第一份專業學報《政治學季刊》創刊號第一篇文章上的第一句話(Andrew et al., 1982, p. 2)。可是，迄今全世界的專業政治學家依然深表同感。早在三十年代，政治學家就說不可能給政治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因為從政治學之命名而看，政治與科學這兩個概念都沒有固定的內涵。」(*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1993, repr. 1957, p. 207)到了五十、六十年代，政治學家還是深刻地感到政治學有「認同的危機」(crisis of ident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1968, p. 282)。雖然政治學系統論大師伊斯頓(David Easton)在一九六八年說：「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有自己的系統的理論架構的〔階段〕已初露端倪。」(*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1933, repr. 1957)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政治學家仍感受到二三十年前的自我認

同的危機(Andrew et al., 1982, p. 2)。一門科學總該有個定義規劃其研究的對象，因而就產生了對待定義的三種態度：(1)堅持在作任何研究之前該先下個明確的定義；(2)持與上相反的態度，認為任何定義都約束學者的研究；(3)認為應該有個定義指明研究的大方向，至於細節則讓研究者自我探索。

1.3 政治學的界說與範疇

沙茨謝納德(Schattschneider)強調應先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學科研究就缺乏重心。人們怎能看清未被界定的事情和研究沒有界定的對象呢？不知道對象，就不能知道要追求甚麼，倘若不知道要追求甚麼，怎麼做研究呢(Waldo, p. 1)？

反對先下定義及決定範疇者則說：「任何試圖求得明晰的政治學定義的企圖都是枉費時間的事。……更切合實際的〔態度是〕讓政治學家去研究他們感興趣並認為重要的事物……。政治的定義或政治科學的範圍是由其內容來決定的……一味地追逐定義……就限制了政治學的發展。因此只有把特定時間內所有政治學家感興趣的課題全都集合起來，才能決定政治學的界限(Issak, 1985, pp. 16–17)。」³

這兩種態度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些極端：人們確實不能只把那些自稱政治學家們所感興趣的東西堆積起來而定名為政治學。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應該有一定的內容；另一方面，政治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的範疇仍在探索中，它的方法也仍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檢驗及自我改進。所以任何先天的定義都難免趨於武斷且限制了政治學的發展。因此，一個適當的定義應該一方面不加限制研究的範圍，另一方面宏觀地標誌着政治研究的大方向。

1.4 何謂政治學？

「政治學」是「政治」(politics)和「科學」(science)兩個概念的合成詞。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的學術界它們都是頗有爭議性的概

念，不過我們不可誇張他們之間的分歧。正如沃爾多(Dwight Waldo)提醒說：「有很多地方當代的政治學家的見解是互相吻合的。」(Issak, p. 17)事實上，政治學的定義和範疇應動態地看，它與時共進，不能和政治學的發展分割，隨著時間的流逝，政治學的意義和探索的範疇也就愈加明朗及清晰，其共識圈也就愈加擴大。

1.5 甚麼是政治？

1.5.1 中國的政治觀

當代政治學應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何謂政治？它研究些甚麼？中國文字是單音字，一個字代表一個概念。如果一個字、一個字的讀和講都不順口，尤其在白話文普遍使用以來更是如此，所以一個概念常用兩個意義相近的字組合而成。「政治」即其一例。過去，古文因着文法的簡潔、書寫的困難，單一字出現的場合層出不窮，縱使如此，後面總還都加個「之、乎、者、也」之類的虛詞，讀起來才鏗鏘有聲。如在本文開端所引述的孔子(551-479)的話：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政」與「治」在中國傳統的文獻裏都指政治，雖有時合而並用，但大多數時間都是分開的。台灣政治大學馬起華教授好像引用了（他並沒說明來源）日本《大漢和詞典》及（或）台北文化大學出版的《中文大辭典》來證明「政治」一辭遠自周朝即已始用。如《書經·畢命》：「道治政治，澤潤生民。」《晏子春秋》：「君順懷之，政治歸之。」《管子·宙合》：「政治不悔。」（馬起華，1977, p. 1）自此而後歷經二十餘朝；近乎三千餘年，延綿不斷。不過把政治一辭變成家喻戶曉者，則如北京大學李景鵬教授所說，卻是孫中山先生。（《中國大百科全書》，1992, p. 482）他在講述民權主義時給政治下定義說：「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張其昀主編，1970, p. 215）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全大陸人民的生活都在前浪接後浪的政治運動之下，人們對政治這一概念的感受就會更無比的深刻了！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政」與「治」皆指國家的政權。這點可從能代表傳統的《四書》對證一下，（我們應當把在中華大地千萬年來自然孕育成長的民族傳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在馬列主義思想支配下所形成的「傳統」要截然分開，因為這兩個傳統的精神是相對峙的——一個講和諧，一個講鬥爭；一個講重義輕利，一個只相信經濟利益——本文所謂傳統毫無例外地都指中華民族傳統）。《四書》裏面的《大學》和《中庸》原是《禮記》裏的兩篇文章，宋朝的大儒朱熹認為其內容涵意豐富卓越，就挑出來作為受啓蒙教育必讀的兩本教科書。《大學》是一篇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的，可是「政」字卻一次沒出現過：在《中庸》裏出現過七次。這七次都出現在第二十章第一段上，即，「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教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這裏所講的「人治」只要不斷章取義，從上下文就能看出它指在有人格修養的人的主政之下的意思）。「政」在《論語》上共出現過二十九次。其中有九次記載當時的王侯及孔子的學生們向他「問政」。即治國之策的對話，在《孟子》上共出現五十一次，其中有九次曰「仁政」，四次曰「王政」，一次曰「橫政」。總的看來「政」有宏觀的意義，包含著治理國家的理想與策略。「治」字在《大學》上出現八次，全都涉及治理國家，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治其家……」（第一章）。「治」在《中庸》上出現八次，也是有宏觀管理的內涵，如：「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在《論語》出現了八次，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述而〉。在《孟子》上則出現四十次之多，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及「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公孫丑下〉，「治」很明顯，指執掌政權，我們也可以說，政是名詞，治是動詞。但無論在《四書》上或「民權主義」上，「眾人」都不是任意集合成的群眾；管理也不是任何方法的管理；政治之所以稱為政治，有別於其他團體，就在於「眾人」與「管理」的特徵上。「眾人」指全國人民，「政」即全國人民的事，有普遍性；「治」即行使最高的主權，有強制性。這兩點默含在中國語